



张甲洲：从清北学子到抗日英雄

在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和清华英烈碑上，共同鐫刻着一位英烈的姓名，他先考北大，后考清华，弃理从文，希望实现改造中国的宏伟理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三省，身为东北人的他已无法在清华校园的书桌上安心读书，毅然回到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书写了一段不朽传奇。他就是张甲洲。



张甲洲像。(资料图片)

少年求学 点燃革命火种

张甲洲，号平洋，化名张进思，黑龙江省巴彦县人。由于天资聪颖，父母对他寄予厚望，起名“甲洲”，意为“甲冠五洲、出类拔萃”。在龙兴镇初等学堂读书期间，他功课门门优秀，但最感兴趣的还是“格致”这一科，因为他喜欢琢磨事物的原理，并立志长大后当一名科学家。

1923年，张甲洲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立齐齐哈尔第一中学，在该校进步老师的启蒙下，他了解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列宁、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种子在他的思想中开始萌芽。次年，因反对军阀张作霖在学校招兵充当炮灰，他被开除学籍。同年，他考取沈阳中华中学。其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作为校学生会主席，他组织联络全市8所学校的同学们上街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张甲洲再次被学校开除。

1926年，他考入齐齐哈尔甲种工业学校。由于他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的坚强性格，加上杰出的组织能力，张甲洲很快成为“公认的学生领袖”，当选为黑龙江省学生会主席。当时全国抵制日货的风潮传及齐齐哈尔，张甲洲和同学们上街积极宣传抵制日货，向市民及商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由于张甲洲在历次学生运动中的突出表现，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认为他是“赤化分子”。成绩优秀的他，被直接取消了公费留日的资格。1927年，张甲洲和同学于天放等人从齐齐哈尔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结伴赴北平求学，期望见识更广阔的天空。

1928年，张甲洲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部(理科)，次年升入北大物理系一年级。到校不久的张甲洲，在进步同学的引导和革命书刊的影响下，很快就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0年4月21日晚，张甲洲和同学们在北大二院大讲堂开会研究营救北大党支部书记李光伟。由于军警探知了消息，包围了会场，张甲洲不幸被捕。在狱中，他结识了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冯仲云，共同的革命追求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经组织营救，张甲洲出狱。1930年夏，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为加强清华大学地下党力量，在党组织的建议下，张甲洲于1930年9月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立志要研究政治，改变中国。

在清华大学期间，张甲洲因其出色的才华和正直的品格，被推选为学生会代表和级委会主席，先后担任学生会卫生科主任、民众教育科主任以及《清华周刊》编辑等职。张甲洲在认真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利用各种学生活动积极开展革命工作。

投笔从戎 归乡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大好河山全部沦陷，3000万同胞惨遭日本侵略者蹂躏。身为从东北黑土地上走出来的热血男儿，眼看着家乡沦陷，张甲洲感到格外沉重与痛苦。在参加了清华师生组织的南下请愿团之后，张甲洲开始积极奔走于北平各高校，动员黑龙江籍的大学生打回老家，组织武装抗日。1932年4月末，张甲洲联络于天放、张文藻、张清林、夏尚志、郑炳文等东北籍大学生毅然放弃学业，一起回到哈尔滨。

在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下，他们一行5人(1人另有任务)来到张甲洲的老家巴彦，开始动员各方爱国志士组织抗日队伍。

当时的“伪满洲国”在日本人的严密控制下，已经结婚生子的张甲洲以筹备婚礼为名，将大家联络起来。1932年5月16日，在一口井前，张甲洲带着来“参加婚礼”的200多人，举行了誓师大会，巴彦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他担任总指挥。根据当地习惯，张甲洲为这支队伍起名号“平洋”，意为平灭东洋鬼子。这是我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队伍。

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力量，打击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张甲洲灵活地提出：

不管什么人，只要有抗日倾向，就可以去团结、合作。他甚至动员土匪，说服他们支援抗日，联合一切抗日力量。为加强领导，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军委书记赵尚志任参谋长，配合张甲洲的工作。

巴彦抗日游击队的成立，轰动全县。游击队在战斗中成长，并日益强大。在赵尚志的建议下，张甲洲在队伍中挑选了一批年纪轻、品行好、身体素质好的小伙子，组成模范队。模范队军纪严格，要求队员不准说黑话，不准损害群众利益，必须起带头作用，为队伍树立榜样。通过模范队的带动，队伍纪律更加严明，风气更加良好，得到更多人民群众的支持。

1932年8月，巴彦游击队一举攻占了巴彦县城，全歼日军1个中队、伪军1个大队，还击落1架低空盘旋侦察的日军飞机。巴彦大捷震动关内外。由于清华大学坚决执行联合抗日的路线，得到了各方拥护，部队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后来，巴彦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这支队伍高举抗日大旗，转战呼兰、绥化、兰西、安达、明水等地，给日军以重创。

1933年1月，张甲洲第二次率部西征，计划与其他抗日部队会合，一同攻打哈尔滨和齐齐哈尔。途中，部队遭到敌人伏击被打散。部队解散时，张甲洲非常伤心，他对战士们说：“咱们还有能干的那天，大家把枪都带回去，马也骑回去，等待时机，我们还要重新组织队伍。”又说：“今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宁死也要当精忠报国的岳飞，绝不能当丧权辱国的秦桧！”

身殒志未酬 薪火永相传

1933年7月，在组织安排下，张甲洲只身一人乘船东去，化名张进思，来到下江富锦中学任教，秘密潜伏起来。不久，他便以渊博的学识、忘我的工作精神，赢得了家长、学生以及当局的一致好评，被晋升为中学校长。

之后，张甲洲以充实师资力量为由，调来游击队的7名战友来校任教，富锦中学成为地下工作者在敌占区的活动据点。张甲洲和战友们不仅教授文化课，还十分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在课余时间，他经常到学生宿舍，给同学们讲解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人物故事，宣传抗日主张与革命思想。在他的启发引导下，先后有3批同学入关求学，而且都参加了革命。

与此同时，张甲洲利用身份之便，积极结交富锦县的日伪官员，逐渐深入敌人内部。为打进日伪心脏，他

连续3个月起早贪黑学日语，拿到了二等翻译证书，得到了县公署日本参事官的赏识，成了“好朋友”。后来，他利用这个“朋友”关系搞了一批经费，修建了两栋能容纳16个班级的二层楼房作为中学校舍。他不仅成功地策反了警察大队长李景荫率部参加革命，而且将富锦中学和自己家都变成党的交通站，为三江地区的抗日武装提供情报和军用物资。

张甲洲行动虽然隐蔽，但因“来历不明，履历不清”引起了敌人的警觉。1937年8月，日本特务机关对张甲洲采取进一步的监视措施，调他到佳木斯伪三江省协和会任职。张甲洲决定再次投笔从戎，重返疆场，到东北抗联11军任副军长，与敌人作殊死斗争。

8月28日早晨，张甲洲率于天放等同志携带400多套衣服、100支枪、3万发子弹、1台收音机、1本地图离开富锦城，奔赴抗联。就在快要到达营地的时候，突然遭遇一股伪军埋伏，一颗子弹正好击中张甲洲小腹，顿时血流如注。一代英雄在上任途中壮烈牺牲，年仅30岁。噩耗传来，全军将士悲痛万分，抚棺痛哭。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身处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张甲洲没有选择追求安逸的生活，而是回到家乡，毅然走上艰难崎岖的革命道路，投身于抗日事业，最终为国捐躯，长眠于黑土地下。其精神何其可贵！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人民为了纪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在哈尔滨建立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张甲洲的遗像位列其中。

1953年，周恩来总理专程到此悼念英烈，站在张甲洲的遗像前，他伫立良久。20多年前，就是这个年轻人对他说要回家乡组织武装抗日，往事历历在目，周总理感慨万千，不由潸然泪下。许久后，他缓缓对着遗像鞠了三躬，语带哽咽地说：“甲洲同志，我代表全国人民感谢你！”

为了深切表达人们对一代抗日英雄的缅怀、热爱和崇敬之情，2002年11月，在生养张甲洲的故乡巴彦，在烈士陵园里敬立了烈士铜像和纪念碑。他曾学习、生活和战斗过的黑龙江省富锦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都建有张甲洲烈士的纪念碑、纪念馆。

张甲洲从书斋走向战场，扛起救亡重任。他未及见山河重整，却用热血为后世铺就觉醒之路。斯人已逝，然其凛然风骨与未竟壮志，仍如黑土地上的白桦，挺拨于岁月长河。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嵇文甫创作河南大学校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开封后，河南第一师范的学生们积极响应，纷纷走上街头，集会、游行、演讲，声援北京。著名学者嵇文甫慷慨解囊，捐款相助，支持学生运动。

有一天上课时，嵇文甫发现学生徐玉诺没来教室，放心不下，赶紧派学生四下寻找。结果，在开封南关火车站附近找到了他。原来，由于反动军阀的阴谋破坏，开封学生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年轻且容易激动的徐玉诺痛不欲生，准备卧轨自杀，试图用自己的生命来唤醒同胞。嵇文甫震惊之下把徐玉诺找来，耐心开导了好半天，告诉他韧性战斗的道理。徐玉诺渐渐平静下来，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徐玉诺走上了文学道路，将满腔的爱与恨化作一首首新诗，发表在各大刊物上，成为了20世纪初中国诗坛的一颗新星。

抗战时期，嵇文甫作为河南大学教授，随学校辗转搬迁至伏牛山深处的嵩县潭头镇。当时，河南大学办学设施不足，生活条件艰苦，又值国难当头，师生士气低落。为提振师生精神，鼓舞抗战斗志，学校决定创作一支校歌。嵇文甫当仁不让，主动请缨。校方也认为嵇文甫是校歌作词的不二人选，一则因为嵇文甫乃文史大家，也是积极抗日的知识分子代表，深受师生信任；二是抗战开始后，嵇文甫已经创作了《献给祖国》《农民战歌》《走出象牙塔》等多首歌词，有良好的创作基础。

嵇文甫领受任务后，在简陋的民房里夜不能寐，他饱含着对日寇的仇恨，很快写下国难当头之时中原知识分子的泣血呐喊：“嵩岳苍苍，河水泱泱，中原文化悠且长。济济多士，风雨一堂，继往开来扬辉煌。四郊多垒，国仇难忘，民主是式，科学允张，猗欤(与)吾校永无疆！”

嵇文甫作词、陈梓北谱曲，二人的合作可谓珠联璧合。不久，这首诞生于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的河南大学校歌，开始在大山深处唱响。演唱者无不动容，并成为一代又一代河大人继往开来、共克时艰的战斗号角。

(据《人民政协报》)

钱钟书的冷和热

钱钟书是大学问家，但他不喜欢交际，几乎从不拜访别人，也讨厌别人来拜访自己。每当有客人来访时，他常常称病谢客。过春节的时候，有人到他家去拜访，说声“春节好”欲跨步进门，钱钟书却从门缝里说：“谢谢！谢谢！我很忙！谢谢！”说完就毫不客气地把门关上了，让访客十分尴尬。画家黄永玉与钱钟书是世交，并且与钱钟书住在同一座楼，但在20多年间，他也只到过钱钟书家一两次。钱钟书每天都能收到一些信件，很多信件是要求登门拜访他的，钱钟书无奈地说：“每天要回信件封信，都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钱钟书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做法，常常会让人产生误解，认为他是个待人没有任何温情、冷冰冰的人物。果真如此吗？其实不是，在钱钟书冷淡的外表下面，其实藏着一颗热忱的心。

当年，钱钟书在光华大学教书期间，收到了同学常风从太原寄来的一封信，那封信写得很消极，充满了悲观厌世情绪，说自己“很不得志、想自杀”。钱钟书看完信后，立即着急起来，他赶紧写信对常风进行劝说，劝他“有希望，死不得，而无希望，又沾不得。”并随信写了一首诗送给常风：“惯迟作答怨书来，怀抱奇愁郁莫开。”常风接到钱钟书的信以后，非常感动，在钱钟书的开导劝说下，他从消沉中走了出来，又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后来，常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在学上成就斐然。

原来，钱钟书之所以对来访的客人冷淡地拒绝，是因为他一门心思用在研究学问上，不想让日常的交往打扰自己。而一旦知道了有人需要帮助时，他就会以百倍的热情给予关怀，帮助别人走出困境，毫不吝惜自己的付出。他外表待人冷漠，内心却古道热肠，骨子里藏着大爱。

(据《联谊报》)

冯其庸写诗见真情

红学家冯其庸擅写诗词。他诗风质朴，意境高远，别有情趣。

冯其庸诗作多浪漫率真之气。冯家庭院有一块奇石，高约丈许，嶙峋向天，如揖如拜。冯其庸给石头取名“天惊”，并作诗一首：“天惊石破落园中，排闥送青万象通。扑面奇峰迎雅客，方知此老是颠翁。”冯其庸的居所名曰“瓜饭楼”，这与他的苦难经历有关。念及此事，他又题诗一首：“老去种瓜只是痴，枝枝叶叶尽相思。瓜红叶老人何在，六十年前乞食时。”

冯其庸的题画诗托物言志，耐人寻味。他的画作《嵩阳古柏》只绘一株古柏，根深干壮，枝繁叶稀，苍劲挺拔，顶天立地。上面题了诗：“汉武帝巡祀已陈，司马笔久封尘。嵩阳老柏今犹在，青眼看人万世情。”再如《古梅图》，诗曰：“我家一树千年梅，移自深山万朵开。老榭嵒岍龙蛰起，曾经沧海风雨来。”看似写树，实则他自身的写照。还有一幅《水墨葡萄图》，诗曰：“生小青门学种瓜，老来藁笔走天涯。砚田活水无穷乐，画到青藤更着花。”其谦虚之态溢于纸端。

冯其庸的题画诗，曾得到刘海粟的高度赞赏。有一次，刘海粟请冯其庸为他刚画好的八尺大幅红梅上题诗，只见冯其庸挥毫写道：“百岁海翁不老身，红枝一树见精神。丹心铁骨分明在，不信神州要陆沉。”刘海粟极为满意，连声说这幅画要自己收藏，不能送给别人了。

对身边的普通人，冯其庸也多有夸赞之语。比如，他为扎根新疆考古事业默默耕耘的王炳华所感动，写诗赞道：“龙沙万里是生涯，雨雪风霜意更赊。不向冰天炼奇骨，哪能雪地作红霞。”无独有偶，喀什司机马振侠曾驾车送过他。后来冯其庸旧地重游，又问起这个负责任的司机，怎料马振侠已不幸离世。冯其庸悲伤不已，深情地写下一首诗：“万里故人来，不见君可哀。昆仑风雪夜，流水细细裁。”

(据《人民政协报》)

太行根据地的社会调查如何落地

为巩固根据地政权，廓清内外敌对势力，太行区党委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政策指导下，逐渐摸索形成以阶级分析为基础，深入乡村的调查风格和工作方法。就此，太行区党委成为中共中央贯彻社会调查号召的突出代表，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政权的发展。

扎根太行农村开展社会调查

1938年5月，自陕北转战至华北后，为尽快了解与适应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一二九师后方政治部即翻印《社会调查大纲》，以便各部队摸清地方实情，迅速巩固地方政权。同年10月，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与中共晋冀豫区委会上提出要从阶级观点出发，进行调查统计工作，帮助处理统战工作。1939年，民运部组织进行的太北六县概况调查，成为太行根据地系统性、有组织的首次实践。3月下旬，八路军总部襄垣南丰沟会议上着手布置社会调查，计划“在半年内调查长、潞、襄、屯、武等六县”。

1941年，晋冀豫区党委考察团于辽县做阶级经济关系变化调查。2月，晋冀豫区党委决意加强群众工作，组织领导农救会干部进行农村调查，以推动减租减息。8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规定》(即“八一决定”)，号召在全党自上而下地进行调查研究。此外，还特别要求在相关城市、边区设立专门的调查研究室。同月，杨尚昆给李雪峰和安子文去信，认为太行根据地在“八一决定”发布后并无实际进展，“在过去做的实在还不够”，现在许多同志到中央后“少有具体材料可以回答”有关“各地区

战前战后的阶级关系变动”。

中共相对于太行山区的农村社会来说，无疑是外来者角色。加之干部队伍存在主客问题，系统性地组织建设和工作方法尚未成型。就此，杨尚昆希望太行根据地可以尽快推进社会调查，并及时搜集调查材料，以供中共中央及北方局作政策参考。

经常性与时限性结合

调查研究并非单向的，在调查纲领和研究任务下发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仍需要持续接收来自地方实践过后的经验，特别是重要参考材料。

为检查各地对调查研究决定的执行程度，中央书记处在1942年3月特别提出六条问题，以敦促各根据地检查贯彻程度，各地需“根据以上问题加以详细检查，将执行调查研究的成绩缺点经验总结电告中央”。同年12月，中共中央鉴于各根据地机关冗杂，“与目前及今后极端严重的分散的游击环境完全矛盾着”，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对此，晋冀豫区党委做出积极回应，增设了调查研究室和参考室，在地委增设调查室。

毛泽东曾将巡视工作视作“走马看花”式的工作方法，还提倡与“下马看花”相结合来深入调查研究。太行区党委组织实践了巡视制度。如巡视团据其某次行军“经过辽、黎、偏、涉、邢、武一带大概观察，以及零星调查所得”，对太北区提供了工作指导。“由于不全面详细了解五、六两区以及整个太北(区)的工作情形，只能简单提出如上意见供给你们参考。你们的意见如何，希望很

快能够告诉我们。”

北方局在关于1943年机关的几项工作部署中提到，十一月与司令部合并伙食单位后，较有进步，各部门干部一般均能深入乡村，进行群众工作与调查研究工作，并决定在三月之后“分派巡视团赴各区视察工作”，其中，“罗瑞卿带一巡视团赴太岳，刘锡五带一巡视团赴太北，其他机关干部在驻地深入下层进行群众工作与调查研究工作”，以此来领导整风运动及总结过去工作。

层层贯彻中推进调查研究

1943年，中共中央及地方根据地持续调整。趁中共中央统一布置下减租减息的运动任务，太行区的调查工作即统一由李友九负责，各地、县若干典型村的调查材料与此前各式调查材料得到了汇总和整理，为李雪峰、邓小平等区委领导提供了扎实的政策参考。

1944年7月，毛泽东鉴于地方根据地的革命实践日益成熟，但中央对其具体情况仍不十分了解，先后下发了相关文件，要求各地进行调查并答复相关问题。除统一战线、城市工作、减租减息等老问题外，毛泽东特别注意到了中共政权问题、部队与农民发展生产问题等。为及时答复中央，邓小平即指示李雪峰提供调查材料以反映实际问题。

根据一手调查材料，邓小平于8月24日向毛泽东发去电文，所用材料均为太行区调查材料。基于这批“内容极好”的调查材料，毛泽东获悉了切实的根据地社会实情，肯定了太行区的工作，很快批转各地。至1945年7月，中